清史纂修

察存耆《光绪之死》一文的考释

钟里满

察存耆《光绪之死》[①]一文，是记载光绪死亡的珍贵材料，笔者结合档案、时人日记、报刊及今人研究成果等对该文做一考释，以期推进光绪死亡真相问题的研究。(以下各部分开头的楷体内容为《光绪之死》一文的原文。)

一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吗？"

察存耆所记述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光绪帝下午六点半钟死亡后发生的事情。

"前天"就是十九日。拙文《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时间考》[②]分析，实际情况是，十七日内务府大臣们已经打电话给在外地的医生，催促他们赶紧回京，医生们已经被通知晚上在西苑附近待命。十八日起，四个内务府大臣开始轮流晚上值班。十九日光绪帝已经不能说话，由太监向医生转达病情。又据载沣日记，业已紧急通知庆亲王奕劻回京了，怎么还会"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二十日溥仪已经进宫，都在为后光绪时代做准备。上谕档里更有"枢灵已散"的字样，与二十日当日施焕开出脉案中"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内务府大臣增崇都是亲历，他完全了解光绪帝病危的态势。

《文史资料选辑》对察文中"发抄"一词的注解是：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③]

脉案和药方，都是由内务府抄录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军机大臣们。正因为"发抄"的就是内务府，所以察文中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吗？"其实这种说法对内务府大臣们是不成立的，他们早就知道所有情况。然而对一般人来说，却是成立

[收稿日期] 2009 - 04 - 15
[作者简介] 钟里满（1947 —），男，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北京 100859

的，这是由于报纸的报道严重滞后（见后分析）。我们也由此知道，光绪病危的情况，对内务府的郎中、员外郎还是保密的。

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杜钟骏写的《德宗请脉记》中所述：

> 至十九日夜，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④

拙文《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已经证明，此日其实是二十日。这种重大情况的电话，如果没有内务府大臣的亲自指示，是绝不可能发出的。而察文说二十一日下午内务府的大臣们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反差如此之大，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对自己的亲戚们也都一直守口如瓶。但他们没想到，光绪帝将死的消息传来时亲戚们都正好在场，于是他们便做出“真是想不到”的反应。反之，如果他们立刻说，“此事我早已知之”，将来传出去，反倒会引来不必要的猜测，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当时一般的人只有一个渠道了解光绪帝的健康情况，这就是报纸。而报馆这类消息的来源，就是内务府：

> 外城巡警总厅通谕京师各报馆云：各报登记新闻，凡内务府传出之御医脉案准其记载，除脉案药方外，不得据传闻之词，遽行登载，用昭敬惧，仰即遵办，勿违此谕。⑤（以下凡注明是《申报》并标记日期的引文，不再加注。）

可见，这些清宫深处的种种消息，绝非各报馆自己臆造。向社会公开光绪帝的脉案，是经过官方同意的，由内务府传出。

笔者将《申报》的报道和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脉案做了对比，看到经常是迟报，缺报。而且有的脉案真，有的脉案假。据此或者可以看出当政者怎样迷惑外界，而这也正是它的研究价值之所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帝死前数天的报道情况：

> （《申报》）11 月 9 日（十月十六日），电一：“慈宫病已康复，皇上亦小愈，惟召见军机仍慈宫一人。”电二：“皇上胃不和，畏饮食，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仍力疾批折，内务府各大臣镇日在内。”电三：“十四日（农历）庆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药方至午后始散。”电四：“枢垣昨又致电江督，催令各御医迅速来京。”

“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按鹿传霖日记，记的是十二日的事⑥，十六日才见报。这应是内务府提供给报纸的消息，就有数日的延迟。

> （《申报》）11 月 14 日（十月二十一日），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专电：“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并未召见军机。”

而此日即为光绪死日，所刊登的新闻是昨天刚刚发生的。应该说，下午 5 点前最高层政治上的新决定以及落实情况，新闻当天晚上就用电报提供给各地，所以第二天就见报。

但是，笔者特别注意到，从十六日到二十一日这关键的四天之间，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光绪帝病危的消息。难怪察存耆的叔父们为什么在此日听到光绪帝将死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此日的报纸上还在说“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

11 月 16 日（十月二十三日），《申报》发布光绪帝驾崩的电讯：“上病大渐，今日酉正二刻升遐。”“此电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原来，《申报》接到这样的消息，是在光绪帝死日当天晚上。按说速度是相当快了，因为在北京的起居注官恽毓鼎也只是第二天早上才得到确切的通知。⑦报社之所以也不敢信，是因为在这之前数天光绪帝病危的消息什么也没有，突如其来又是这么个结果，因此到光绪帝死后两天才敢发出这则新闻。

那么，那关键的四天之内的情况，是什么时候才报道出来的呢？居然是到了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光绪帝死后四天了，才加以“追记两宫病情”：

（《申报》）11 月 18 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申报》第一张第五版：

> 追记两宫病情：……初十日恭逢皇太后万寿……是日，过于劳动，晚间即觉疲

倦。十一日皇上勉起办事。慈宫稍有不适，传谕停戏。十一日晚间，皇上稍患感冒，身体微热。十二日早即觉两腿无力行动，胃亦有病，不思饮食。是日，适逢慈宫仍未康复，故未召见军机。十三日，慈宫稍愈，皇上病甚。十一钟时，慈宫特召庆、醇二邸至寝宫，密对一钟之久。据内监云，系议宫廷大事。内务府大臣均镇日在内。因商量皇上药方，枢臣往往午后始散。十四日，皇太后小愈，皇上两足仍乏力行动。据称大便不通者已积至七、八日。而枢臣以应办之事已多，不得不面请圣训。遂由皇太后升勤政殿，召见军机。章奏仍系皇上朱批。近四日来，内廷颇觉惶惶。因十一日传谕停止演戏，以至都市谣啄纷传也。又十六日函云：两宫违和，枢府事繁，庆邸本难离京，因慈宫催询万年吉地工程，并谕庆邸先往验收。庆邸即于十五日请训出京。日来紧要事件，均不核办。一切奏折，均封存枢府，俟庆邸回京再办。又十八日函云：今早御医吕用宾大令进内请脉。闻用药极为平和。已将药方、脉案咨各部院知道。皇太后因多食梨果，偶患腹泻之症，曾由张院判请脉诊治。

察存耆的叔父们想从察存耆的父亲增崇那里了解到光绪帝死前四天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增崇也不会向他们泄漏这样的宫内机密。这次不得不说，是因为有宫里专门派人来通知，家里的人正好在场，都知道了，已经隐瞒不住了。察的叔父们平日所知的，不会比当时的报纸知道得更早、更多。因此，二十一日下午他们听到光绪帝病危时所表现出很惊讶，应该是很自然的。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增崇等内务府大臣这时还在家吃饭，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我们看军机大臣鹿传霖本日的日记：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⑧

这里的“内大臣”即指内务府大臣。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光绪帝已经到最后时刻，但此日吃饭还是可以各回自家的。下午六点半时，正在家里吃晚饭，光绪帝死，宫里的人急忙通知这几位内务府大臣，因为下一步如何处理，在等他们的指示。

当然，二十一日光绪帝死亡，居然还发出了向各地征医的上谕，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之一。这恐怕是政权的巨大惯性操作所致，但这不能解释为内务府大臣们不知道光绪帝的真实情况。

二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我的姑丈、内府掌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医士“终日不得闲”。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

光绪二十四年，发生了戊戌变法。一般认为八月六日变法结束。现存只有五月、六月的脉案，但也很不完全。七月、八月完全没有。再出现则是政变后不到一个月的九月初三日的脉案了。在这之前诊病的医生，都是太医院的御医。从九月三日的这张脉案看，已经有陈秉钧这样的地方推荐的医生了。这是因为政变后第四天，八月初十，慈禧太后即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全国召医。

召医的上谕发出不到一个月，九月初三、初四两日，出现了中医和西医各自为光绪帝诊病的记录：

九月初三日。卢秉政、庄守和、朱焜、李德昌、陈秉钧、范绍相，请得皇上

脉息：左右寸细软，左关微弦而数，右关虚数，左尺虚数，右尺数而无力。证属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昨夜前半夜未眠，后半夜眠不甚沉。晚昨（昨晚）大便一次，溏涤，今早大便二次，稀溏，色白，兼有糟粑未化。少腹气坠，有时头晕眼涩，耳鸣而塞，口渴咽干，时或作痒，咳嗽少痰。腰痛，腿膝无力，麻木空痛。神倦喜卧。小便频数，色白而少。气怯懒言，语多则牵引少腹作抽。时或牙痛、口疮，手指作胀。常上（时常）恶寒。有时胸满糟杂作呕。面色晃白，左颧色青而滞，右颧淡白。下部潮湿寒凉，夜梦闻金声则遗精，或滑精，有时似滑未滑。躺卧难以转侧，不能久坐久立，不耐劳苦。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治拟中培脾胃，下固肾真，上清肺气，滋养肝阴之方，以图缓效。今议用八珍麦味地黄汤，加减调理。

潞党参，四钱；焦于术，三钱；茯苓神，三钱；杭白芍，三钱；淮山药，三钱；干地黄，三钱；川杜仲，二钱；麦冬，三钱（米炒）；山萸肉，二钱；补骨脂，一钱五分（盐炒）；兔丝子，二钱（酒炒），炙甘草，一钱。

引用：金石斛，三钱；芡实，三钱；莲子肉，三钱。

其中，卢秉政为知府、朱焜为同知、陈秉钧为郎中，都是外省推荐来的；庄守和为花翎二品顶带太医院院使，李德昌为花翎二品顶带太医院右院判，范绍相为三品顶带太医院御医。

陈可冀对这一脉案的解释是："光绪帝于二十四年戊戌之举不成，在八月六日（公历 9 月 21 日）凌晨被慈禧囚禁瀛台，身居囹圄。七情郁结，遂成发病之源，且夙有气血亏损，肝脾不足，心肾两虚。故诸症蜂起病势迁延。治疗惟从先、后天求法，而其中尤以后天（脾）于发病诸因素更属重要。以中土得培，则营卫和，升降调，而诸脏自然可望功能恢复。"[9]（后文引用此书时，如注明日期，一般不再加注）

第二天，九月初四日，法国医生多德福为光绪诊病，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有录：

由堂来抄，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蒙约诊视大皇帝，并恭悉交亲（亲交）病原说略，熟思面答之语，现得悉：身体虚弱，颇瘦，劳累，头面皮白。饮食尚健，消化滞缓，大便微泄，色白，内有未能全化之物。呕吐无常，气喘不调，胸间堵闷，气怯时止时作。当日蒙允于听，肺中气音尚无异常先症，而运血较乱，脉息数而无力。头痛、胸间（闷）、虚火、耳鸣、头晕、似脚无根，加以恶寒，而腿膝尤甚。自觉指木，腿亦酸疼。体有作痒处。耳亦微聋，目视之力较减。腰疼至于生行小水之功，其乱独重。一看小水，其色淡白而少。迨用化学将小水分化，内中尚无蛋青一质，而分量减轻。时常小便频数而少，一日之内于小便相宜似乎不足。在说略注意遗精为要，系夜间所遗，感动情欲，昼间则无，而且白日似不能举。

详细察悉皇帝圣恙，实知由于腰败矣。按西医名曰：腰火长症。若问腰之功用，则平人饮食之物入内，致化其有毒之责（质）作为渣滓，由血运至腰，留合小水而出，以免精神受毒。设若腰败，则渣滓不能合小水而出，血复运渣滓散达四肢，百体日渐增积，以致四肢百体有如以上所开之乱。

至于施治之法，总宜不令腰过劳累而能令渣滓合小水同出之一。养生善法，总之莫善于惟日食人乳或牛乳，他物不宜入口。每日约食乳六斤左右，而食牛乳时，应加入格辣多思，约一两五钱（此物系化取牛乳之精洁者，译名乳糖）。如此食乳须数天矣。若以药而论，则用外洋地黄末，实属有功于腰，于擦可安痛楚。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依然。照此养身之法，行之小便调和喘气闷堵可除，以致病身大愈。

其遗精之症，软弱而少腹皮肉亦虚而无力，不克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

然后止遗精益易也。

敝医官情殷效力，管见若此，详加以闻。

陈可冀认为："清宫廷延请外国医生诊病，始于康熙皇帝。此案系光绪帝于二十四年病重时延请法国使馆医官多德福诊视病情录。限于彼时翻译水平，加之行文修饰，故有费解处。综合分析，其诊断当系肾炎，因之而作尿蛋白定性检查。治疗之记上亦提出了高糖高蛋白饮食（牛乳加乳糖），至于外用洋地黄末干擦，疗效如何，不得而知。然据光绪帝之病情分析，无明显水肿、尿中亦无蛋白，更无尿毒症之征象，似非属肾炎。"[10]

这份病历是否存在"限于彼时翻译水平，加之行文修饰，故有费解处"，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但很关键的问题。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亦引此档案，并说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当时得到一份法国公使馆致总理衙门的诊断书，并将之呈报首相兼外相大限重信。该件为法文，茅海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庆华先生翻译如下：

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诊断书

——1898 年 10 月 20 日呈总理衙门

1898 年 10 月 18 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博士奉中国皇帝的谕旨，入宫诊病。通过陛下欣然提供的记录并回答询问，对陛下的病情做出如下诊断。

体质衰弱，明显消瘦，精神不振，面色苍白。

食欲尚好，但消化缓慢，轻度腹泻。排泄物呈白色，且未完全消化。频繁呕吐。气闷导致呼吸不均匀，发作时更显焦虑。肺部听诊未见异常。

血循环不好，常出现紊乱。脉弱而频数，头痛，胸闷热；耳鸣，头晕，站立困难。

除上述症状，腿、膝部明显发凉，手指触觉不明显，小腿痉挛，全身发痒，轻度耳聋，目光迟钝，腰痛。

尿频最为关键。表面看，尿液白而透明，尿量不大；化验未见蛋白，尿浓度减淡。陛下尿频，量少，24 小时内尿量低于正常尿量。陛下强调遗精，常发生在夜间，之后出现快感。这类梦遗，多由白日自觉勃起功能减退所致。

经认真分析这些不通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

正常情况下，血液流经肾脏时，将营养交换后的残渣滤出；而这类残渣对肾脏器官正是一种毒素。当肾脏损伤不能将这些毒素随尿排出时，这些物质便由血液带到其它脏器，在那里堆积，引起脏器运行紊乱，出现上述症状。

目前，有必要对饮食作出规定，以不使肾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并为有利于残渣随尿排出。最佳的食品是牛奶，不能吃其它食物。仅喝牛奶或人奶即可，每天喝 3—4 升，奶中加 50 克乳糖。这种饮食制度应坚持若干个月。

药物治疗：洋地黄粉疗效最好。腰痛可以通过按摩和诱导法减轻。

一旦排尿正常，气闷消失，病情就回明显好转。

遗精是由体虚引起的，特别是小腹肌肉衰弱，不能控制精液的流出。目前首先要重视肾功能，要加紧治疗。肾脏功能恢复了遗精问题即迎刃而解。谨向陛下陈明愚见，渴望能减轻陛下的病痛。[11]

前后两天，中医的脉案和西医的病历，自然会很不相同。但法文病历的近、现代翻译，对照下来，但应该说，内容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至于清廷方面怎样判读这份病历，有如下侧面的记载。

法国医生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即向当时的英国外相沙侯报告说：

为了我的建议，由一位外国大夫给皇帝一个健康证明书。庆亲王与总理衙门各大臣昨天由该衙门三位官员来对我表示谢意。官员们通知我说，中国政府已经安排妥当，法国使节德泰夫（即"多德福"——引者注）在今天早七时来诊视皇帝，证明他的病况。他们说，已经选好了

法国大夫，因为我们（英）使馆的大夫请假回国了。

九月十五日（按中国旧历），窦纳乐又打电报给给英国外相：

正如我 10 月 18 日（即旧历九月四日，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的日期——引者注）的电报里所报告的，法国使馆德泰夫大夫就在那一天诊视了中国皇帝的病。外交团的领袖从总理衙门接到一个大夫的诊断报告，指出：虽然没有立刻的危险，但皇帝是有了微恙……我想慈禧及其党羽对于满足了和他们相反的各国意见是有些忧虑的。⑫

最值得惊奇的是，十月二十七日脉案中有一大段文字：

……耳内烘烘，偶有听无所闻，两肩酸坠疼痛。每于言语少腹作抽，推揉按摩自觉舒畅。恶寒嗜卧，肢体懒倦，周身筋脉拘急，久坐腰酸，久立腿疼。劳累逾时，则心神迷惑。心中无因自觉发笑。

从这天开始，一直到年底，都有上段文字的变体保留在每天的脉案中。以其中“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这几个字最为典型。

下一年是光绪二十五年。可以发现，从正月到十二月，所保留下来的脉案中，也都有这一段文字的变体，而且“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还是一字未变。

再下一年是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察文所说的“八国联军侵华那年”，脉案从正月到七月一日（七月一日后脉案缺失，应是政局剧变所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奔，八国联军七月二十四日陷北京），和上年一样，所有的脉案都有那一段文字的变体，而且“心中无因自觉发笑”也还是一字没变。

因此，光绪二十五和二十六两年，所存脉案上都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开始出现的一段文字。但毕竟十月已经不是春季，不太符合察文所记：“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

比较符合的，是关于“闻金滑精”。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应属戊戌变法开始，脉案上第一次出现有“闻金滑精，以及梦闻金声亦有滑精之候”。整个五月，只此一次。因本年一、二、三、四月的脉案无存，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记录。六月的脉案没有这样的记录。再下来，七月、八月的脉案又是无存。

第二次是九月初三日：“夜梦闻金声则遗精或滑精，有时似滑未滑。”这已经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个月。

然而第二天九月初四，法国医生多德福的病历中却没有这一条。而同一天中医的脉案中有“久有夜梦金声则遗精或滑精，有时似滑未滑”。

下一张则是九月初八的脉案，就没有这一句了。一直到十一月十二日，都没有这一句。

从现存脉案看，从十一月十七日开始，直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月后脉案无存），脉案都无此记载。再出现脉案就是三十四年了，但也没有记录这个症状。

这些包括“遗精”、“心中无因自觉发笑”等症状，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医生是不会知道的。显然，最早这一类文字来自光绪帝自己的病原。但“奉旨病原许添不许撤”，当然不会是光绪帝的上谕，而是慈禧太后的懿旨。

至于中医对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一段时间的身体情况到底如何，还可查到著名中医对四个月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的脉案的看法之不同：

正月十五日，朱焜、门定鳌、杨际和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弦而稍数，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表感已解，尚见面色青黄而滞。左鼻孔内有时觉疼、发燥，时或涕见黑丝。头觉眩晕，坐久则疼。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咽物痛觉轻减，其味仍见发咸。舌胎（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咳，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胞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腹中窄狭，少腹时见气厥，下部觉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

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坐立稍久则腰膝酸疼。劳累稍多则心神迷惑，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加以劳累，腰酸腿疼愈甚。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虚不受补，是以用药掣肘。今拟议用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水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

云茯神苓各二钱，淮山药三钱，细生地三钱，麦冬二钱去心，元参三钱，杭白芍二钱，霜桑叶二钱，甘菊二钱，金石斛二钱，桔梗二钱，竹茹一钱五分，甘草八分，引用炒谷芽三钱。[13]

这份脉案中有很多文字都和前一段时间的脉案中有关的文字基本一致。

陈可冀对此脉案的看法是："光绪本月病情无明显变化，故其处方，除因外感而易方外，余皆稍有变动。仍是以补肾养心润肺滋肝为大法，亦病情复杂，脏腑亏损使然。"[14]

已故著名中医陈存仁的看法是："那四位医生所订立的药方，一共享药十四味，所用的药物，没有一味药是烈性的。石斛、元参，是生津清火，大概对他的唇焦舌干有些效用。茯神、淮山药，对他的睡眠有些帮助。生地、麦冬，可以增加阴液，其余如桑叶、菊花、桔梗、竹茹，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药方就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当时的病症，虽然脉案上写出数十种病情，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15]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察存耆关于戊戌变法后他的父亲增崇对光绪帝的健康情况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回忆那些信件的内容，是可信的。

笔者对比了光绪三十三年直至光绪帝死亡前的脉案，同时参考了杜钟骏的回忆录《德宗请脉记》，可以看出，到了这一阶段，那种戊戌变法后的在脉案上积累病情的情况（闻金遗精、心中无由发笑等），就不再出现了。而且恰恰相反，军机处甚至不允许医生们在脉案中出现真实反映光绪帝病情中的严重情况。这种脉案记录中前紧后松的现象，很值得注意。前紧，很可能是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要求那样写，以给外界一个光绪帝病重，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精力的印象。而到光绪帝死前，反倒是军机处让医生们把严重的病情往轻里写，以致只看脉案，感觉光绪帝很像是由于历年积病，逐步虚脱死亡。但军机处未必是受到慈禧太后的牵制，只是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有那样凡脉案都要轻写的要求（光绪帝将死时的脉案则不可能做这种规范了）。这样做出的逐渐衰亡的客观效果，恰恰是慈禧太后这一段时期所乐见的。

慈禧太后病危时，军机处还在那里谨小慎微地审查脉案[16]，其实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能进食，使得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三

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

经与脉案查对，这一段说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个月以后的事。因为九月初三脉案有外请地方选派的医生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其余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属太医院）。到十八日，脉案上已不见了卢秉政，只剩朱焜和陈秉钧。门定鳌是九月三十日开始诊病的。但十月的脉案上，已经不见了陈秉钧。之后一直到下一年的七月二日的脉案上，还有朱焜、门定鳌和其它太医院的医生诊病的记录。之后，便全是太医院的御医们诊病了。因此，人事变动情况，察存耆所记那些信件的文字是准确的。至于太医们这样背后议论地方上来的医生（"谨小慎微"，"迹近钻营"）是一方之言。但这两方面的医生互有矛盾，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样的情形，在力钧的《崇陵病案》中有这样的记录。⑰

因为从其它的资料中很少看到太医院的御医私下对光绪帝身体情况的真实看法，因此察文记各种信中多次提到：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和“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这些信息就非常珍贵了，确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三年之中光绪帝身体的情况是好是坏，御医们私下的看法与法国医生多得福以及陈存仁等人的看法，倒是有某种一致性。特别是“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这一条，在研究戊戌变法后光绪帝健康情况和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四

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

慈禧的这种对太医的指责，是由于她从政治上产生了联想，忌讳别人说她在政治上压制光绪帝。杜钟骏文中有关“消渴”那一段，是忌讳医生们在脉案上谈她的私欲。但都看不出是直接命令医生们把病情描写得严重。相反，都是要医生淡化病情。

慈禧把光绪的病情宣示得非常严重的方法，就是以光绪的名义，向各地大员征召地方上的名医，这是很明显的。而且将病况积累在脉案上，以示病情严重。固然，把病情积累的情况，到光绪帝后期，从脉案上基本看不出来了。但是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到各省招医这一点，却一直保留下来，直到光绪帝死亡的那一天。

至于慈禧太后直接向官员们透露说光绪帝身体不好，则是在光绪帝死前十天的时候了。那是在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日子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和杜钟骏《德宗请脉记》都留下了记录。虽然只有这两条，然而从时机上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五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

人胡同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从拙文《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中所排出的光绪帝死前十日逐日情况的分析，可知内务府的大臣们对光绪的病情的发展，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内务府十七日的记录看，十八日将“轮流在西苑公所直宿”就有增崇，十八日晚带领杜钟骏去见军机大臣们的也是他，当时“内务府三位”都在场。光绪死日凌晨，张仲元开出病危脉案，内务府大臣们都会知道，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午，杜钟骏等人诊病出来，也开出病危的脉案，内务府三大臣也都在场，包括增崇在内。怎么会到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光绪帝还未死）得到光绪帝病危的通知时，“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呢？怎么会“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呢？

六

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其实，这里指的就是小殓和大殓。

皇帝死后当天就得小殓（穿戴整齐），嗣皇帝和诸皇子、皇孙均穿孝服、剪发辫，宫内女子摘掉一切头饰，以示对死者的肃敬之意。小殓次日举行大殓（尸体入棺），大殓时，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大臣皆入乾清门瞻仰遗容，各公主、福晋等要齐集乾清门内丹陛上，随同嗣皇帝行大殓礼。⑱

察文其实是在暗示四个内务府大臣没见到光绪帝最后的面容。使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的砒霜中毒会“七窍流血”。

而当日的《起居注》是：

> 二十一日癸酉。上遘疾大渐，酉刻龙驭上宾。钦奉……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是日，嗣皇帝趋诣大行皇帝前，哀恸擗踊无算……奉懿旨：……内务府大臣继禄增崇恭办丧礼……

也就是说，嗣皇帝宣统帝亲自到光绪帝的遗体前致哀。但这是不是小殓呢？也还不是。

二十二日的起居注才提到早晨进行小殓。但是，这个三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在载沣或隆裕等人的监护下被抱到现场的。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面对承旨办理丧事的内务府大臣不可能有什么逾礼的事。

这样一来，无论当时察存者对“停放”一词如何理解，二十一日光绪帝的小殓不但没有在内务府四个大臣赶到时已经做了，反倒是当天什么也没动，确实是放在那里（增崇本人甚至奉懿旨，为办理丧礼的内务府大臣之一），下一日早上宣统皇帝来了之后，才在众人看视下进行小殓的。而且，立刻用万年吉祥轿送至乾清宫，举行大殓（见后）。

砒霜中毒并没有什么“七窍流血”，其实光绪皇帝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现代法医学从来不将病人是否有“七窍流血”作为判断是否砒霜中毒的根据。[19]宫内一切照章办事就是了。

七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消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关于小殓、大殓，在光绪帝死后第二天的《起居注》是这样记录的；

二十二日甲戌。……是日卯刻，上诣涵元殿恭视大行皇帝小殓，毕。奉大行皇帝灵驾奉安乾清宫次间。上成服敬视大行皇帝大殓，毕。安梓宫于乾清宫正殿，行殓奠礼。毕。上还西苑圣祖母太皇太后前请安、母后皇太后前请安。

原来，小殓是在光绪帝死后第二天（二十二日）早上卯刻才进行的。而且还是在宣统皇帝（由于他当时只有三岁，因此应该有隆裕等人在场监护）又一次到现场后进行的。然后，遗体从瀛台转移到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在宣统皇帝和众人的看视下进行了大殓。

再参看当时军机大臣等人的记录：

《鹿传霖日记》：

二十二日，阴，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复至直房。内外折仍照前三日拟进呈，交下摄政王代批。[20]

《荣庆日记》：

十月二十二日，天容惨暗。寅起，至西苑门与那、铁恭候，卯正（6点——引者注）大行皇帝吉祥轿入宫，随入步哭至乾清门外，门掩，复至景运门外久候，申初归。[21]

《恽毓鼎澄斋日记》：

二十二日，阴，晨兴，惊悉大行皇帝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今日辰初用吉祥轿还宫，巳时升殓，阿哥即皇帝位于柩前，嗣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兼祧大行皇帝。[22]

《许宝蘅日记》：

十月二十二日，四时半起。五时半到东华门，已启，至西苑门见吉祥轿，始知大行皇帝于昨日酉刻龙驭上宾。[23]

四个人的日记和起居注的记录是一致的。时间顺序是：卯时小殓后，辰时已经移入乾清宫，巳时升殓（大殓），三个时辰是先后紧接

的。有的人的日记提到光绪帝是用吉祥轿移到乾清宫的，有的人（许宝蘅）亲自看到了吉祥轿，有的人（荣庆）甚至是跟着吉祥轿一直到乾清门的，而不是“消声匿迹地移入宫中”。更不是“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因为鹿传霖的日记甚至记录到他在乾清宫还可以“瞻仰遗容”，则内务府大臣们更不必说。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光绪帝《大行皇帝升遐档》里看到最为详细的现场记录：

> 十月二十二日辰初二刻，请大行皇帝升入吉祥轿。总管李长喜、尹义执香摆对前引，进仁曜门，出得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隆宗门。辰初三刻十分，进乾清门，至乾清宫。辰正，清在回床安放毕，各退。
>
> 十月二十二日辰初三刻十分，大行皇帝吉祥轿进乾清门。辰正至乾清宫殿内，回床安放。
>
> 十月二十二日皇后率瑾妃在乾清宫举哀看视大行皇帝。巳初二刻五分，殓入梓宫毕。

时间竟然精确到“分”。即上午 7 点 30 分光绪帝被放入吉祥轿，然后出发。7 点 55 分进乾清门，8 点安放在乾清宫殿内。9 点 35 分在隆裕皇后和瑾妃等的“看视”下，“殓入梓宫”。

对比上面的日记，除荣庆记载吉祥轿启动的时间早了一点，其他人的记录都无矛盾。因此在研究中引用这些人的亲历记录，是可靠的。所以，察存耆说：“……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是因为有关光绪帝小殓、大殓的传言，与事实出入太大，几乎完全相反。

顺便说一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有关大殓的记述，看来也是耳食之言：“……甫至乾清宫……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何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24]

察存耆这一段记录的是他当内务府大臣的父亲的谈话，很生动。光绪帝这几天的病情，作为排第三的内务府大臣，增崇自然不会（不必，也不敢）向家里人透漏实情。但增崇没说真话这件事，却是真的，被察存耆无意中真实地记录下来。

察文中，增崇两次提到光绪帝十九日还没见有什么大病的情况，前已分析，是增崇的掩饰之言。察存耆本人当时年龄还小，却把他父亲的话当真，以至多年后，还把这样的事向溥仪本人谈过：

> 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象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25]

察存耆本人担任过溥仪的外语翻译。再对照上面的察文，可知这位“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正是察存耆。

其实，如果察存耆真的从他父亲增崇那里看过光绪临终前杜钟骏、施焕、张仲元等人写的脉案，就绝不会说“脉案极为平常”，“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了。至于“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那要看是对什么人了。对内务府大臣是不成立的。溥仪本人上文的前一部分，正好否定了察的说法。

八

>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
>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
>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

得“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上半截是小紧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小紧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清鼻涕”与“小紧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光绪皇帝死后，他生前穿用的物件将会赏给溥仪和隆裕皇后、瑾妃的，叫“赐遗念”，给王宫大臣们的，叫“赏遗念”。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行皇帝升遐档》里赏赐的名单中，有摄政王载沣，有朝中重臣张之洞、徐世昌、端方等一批大员，还有内务府大臣增崇等人。这其中，“赏遗念”给增崇、善耆、景丰的物件，都是一样的，均为：黑羊皮帽子一顶，绛色江绸灰鼠皮袍一件，石青江绸金龙褂一件，玉烟壶和玉佩各一件。这与察存耆所说的“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基本一致，和“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也是一致的。他所说的“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看来应该就是那件“绛色江绸灰鼠皮袍”。颁发时间是宣统元年二月初五日，也就是光绪帝死后一百天，这些都是可以和察文所记对得起来的。

但是《大行皇帝升遐档》上记的是“灰鼠皮”，即松鼠皮，并不是察文所说的黑羊羔皮。

松鼠皮是一种野生制裘原料皮。又称灰鼠皮或松狗皮。产于中国东北、华北及新疆等地，以东北产的质量最好，数量也多。皮的特点是形状细长、尾巴长大而蓬松、毛色差异较大，毛尖黑色、毛干有黑灰相间的节色，其余为灰色或灰褐色。松鼠毛被细密灵活，色泽光润。制裘后可制作大衣、围脖、领子及帽子等。尾毛可制画笔及精密仪器用刷。[26]

显然，两者的颜色和毛质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大行皇帝升遐档》说是“江绸”，为镇江所出：而察文说是“宁绸”，应为南京所出。它们是中国清代丝绸业中两种不同的著名品种。两者所记颜色也不一样：绛色为深红色，而酱色为深赭色，也是有区别的。[27]

《大行皇帝升遐档》所记为“皮袍一件”，而察文所记为“两截羊皮袍子”。

“赏遗念”的物件，宫中记载与实际观察上细节上的不同，应以察存耆亲眼所见为准。

笔者之所以如此不厌繁复地考证这些细节，主要是想从侧面了解一下清宫记载与实物是否有很大的误差。《大行皇帝升遐档》中还记有光绪帝临终时所穿衣物，本可以与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现存光绪帝葬衣进行比对。由于上世纪80年代整理时大都已经朽烂，有的很难分辨是那种衣物了。

九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绂，内务府员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儿，小珍儿’的，还有什么‘小宝贝儿’……”那个太监说着，脸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要叫我不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

> 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所谓送药之说，不符合当时情况。"当天下午"的说法，即是说送毒药是在二十一日。然而在二十日，已经有施焕的脉案指出光绪帝是"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二十一日零点时，已有张仲元的"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并指出所开的药须"灌服"。其实是否能灌得下去，谁都看得出来。怎么会是"多多少少像有点病"，而且是"看着光绪吃了"?

关于他听说慈禧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而且，"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则完全可以和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28]以及孔祥吉先生的有关著作[29]，三者互证。

察存耆的这篇文字，正好说明内务府大臣和他的亲戚们多年来就认知"光绪帝先死，慈禧太后后死"的说法，只是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而已。我们也因此知道内务府大臣增崇在这样一个非常时间里，为什么有那样的表现。察存耆的文章是怀疑光绪是被毒死的，光绪帝也确实是砒霜中毒而死，他所记录的事情由于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因此应该相信都是真实发生的。而他年龄还小，不可能了解其中的极为复杂的背景和潜台词（很多事情，他都注明是听来的）。从他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在当时那个历史的非常时刻，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家里发生的真实场面。同时也了解了那个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和他们的亲属们对光绪突然死亡的潜在心里的态度和看法，都非常生动。

①《光绪之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

②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时间考》，《清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③《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47 页。

④《德宗请脉记》，京华印书局。

⑤《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 1 张第 5 版，"紧要新闻"。

⑥《文物春秋》1994 年第 3 期，第 65 页。

⑦㉘《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405 页；792 页。

⑧⑳《文物春秋》1994 年第 3 期，第 66 页。

⑨⑩⑬⑭陈可冀：《清宫医案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361 页；1360—1361 页；1384—1385 页；1385 页。

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57—158 页。

⑫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十集，作家出版社 2005 年，第 366 页。

⑮陈存仁：《业外杂谭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09—110 页。

⑯见杜钟骏：《德宗请脉记》有关酸梅丸的一段文字。

⑰《崇陵病案》现藏首都图书馆古籍部。

⑱刘轼编著：《大清王朝未解之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02 页。

⑲《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 法医病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602 页："（2）急性胃肠型：这是急性砷化物中毒最常见的类型，服毒后迅速发生呕吐、腹泻、有时腹泻频繁，伴有腹部痉挛性疼痛。呕吐物呈米汤样，临床表现甚似霍乱，容易发生混淆。较严重病例可见患者面容焦虑，脱水貌，全身皮肤湿冷。小腿痉挛，尿量减少，蛋白尿，患者可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

㉑《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41 页。

㉒㉔《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405 页；792 页。

㉓转引自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第 133 页。

㉕爱新觉罗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91 年，第 21 页。

㉖《化学化工大辞典》，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第 2182 页。

㉗《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628 页。

㉙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 年，第 9—10 页。